

价值批判与社会转型：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社会史路径及实践^{*}

尉佩云

【提要】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创始人。在对俾斯麦及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分析中，韦勒展现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路径，打破了德国史学对俾斯麦及第二帝国以国家理性、唯心主义、历史主义为主要解释方式的传统，未采用“外交优先”的旧解释，而运用“内政优先”的新方法，将经济发展、工业化、政治结构和社会状况作为俾斯麦政策及帝国理念的根本推动力。在对第二帝国的分析中，韦勒采用长时段起源论和结构分析法，展现了强烈的政治教育与价值批判，引发了激烈讨论。韦勒的社会史研究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批判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后联邦德国社会价值结构调整和学术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和成就。韦勒通过他的学术思想、公共参与和学术态度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 批判社会史学派 俾斯麦 帝国主义 “1945一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过程伴随着对德国传统思想的重估与现代化重塑。古典历史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潮流被讨论、反思,社会价值结构也通过历史思考的不同路径被调整。在此过程中,“1945一代”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他们群体性的历史书写和价值引导,联邦德国逐渐实现了传统历史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德国古典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被“1945一代”历史学家批判反思,目的是使其更好地适应战后新的国家认同的论证方式与文化环境。

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观念的重塑与转型,要求历史研究的思想影响突破学术界并扩散到整个社会公众话语体系。只有这样,历史学家的反思和批判才能被社会接受并传播。20世纪60年代后,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为首的联邦德国比勒菲尔德学派的社会史研究是上述论证的典型案列,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也是西方史学界的重要议题。^① 该学派以批判反思德国传统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族意志视野下德国历史理论的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1CSS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比勒菲尔德学派也被称为“批判社会史学派”,它以联邦德国二战后建立的比勒菲尔德大学为中心,由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创立,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为主要成员。西方学术界对比勒菲尔德学派及韦勒相关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延续至今,学术热度尚在。相关研究基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史学史和史学编撰角度进行的研究,参见 Roger Fletcher, “Recent Developments in We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The Bielefeld School and Its Critics”,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 7, No. 3, 1984, pp. 451-480; Ignacio Olabarri, “‘New’ New History: A *Longue Duree* Structu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1, 1995, pp. 1-29。第二类是以民族国家史、政治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参见 Philipp Stelzel, *Rethinking Modern German History: Critical Social History as a Transatlantic Enterprise, 1945-1989*,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2010; Joachim H. Knoll, “Grollen Aus Bielefeld: Hans-Ulrich Wehler Inszeniert Seine Wissen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Gelehrtenbiographie”,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Und Geistesgeschichte*, Vol. 60, No. 2, 2008, pp. 172-177。第三类是从德国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角度展开的研究,参见 Chris Lorenz, “‘Won’t You Tell Me, Where Have All the Good Times Gone?’: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for Historical Study”, in Q. Edward Wang and Franz L. Fillafer ed., *The Many Faces of Clio: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 Essays in Honor of Georg G. Iggers*, Berghahn Books, 2007, pp. 104-127。

的历史解释方式入手,消解关于德国历史的独特性、精神性的描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新的多元化、社会化的历史解释方式。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既有研究,多从史学范式演进、学科体制和学科平台的建立等角度进行分析,以阐述社会史研究的学科意义,而较少涉及对比勒菲尔德学派学术背景和韦勒学术情况的具体分析。^① 本文以比勒菲尔德学派时期的社会转型及其价值批判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韦勒的生平和思想进行系统分析,目的是更准确地理解20世纪70年代后德国的社会史研究思潮。

一、韦勒及“1945一代”历史学家

纵观德国近现代史,历史学家在现实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几乎成为德国近现代史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② “1945一代”历史学家是其中的代表性群体。“1945一代”也被称为“政治一代”和“怀疑论一代”,最初来源于赫尔穆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的说法,随后逐渐传播开来。^③ 这一群体指称出生于1930年左右、青少年阶段有“第三帝国”时期的生活经历、随后为新兴的联邦德国承担政治甚至教育使命的一代人。在历史学领域,他们的研究兴趣从政治史、国族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记忆史、知识史的研究。^④ 他们被视为对联邦共和国民主化和社会转型做出决定性贡献的一代人。反思德国历史与政治传统文化、历史内疚是这代人代际认同的共同底色。^⑤ 无论如何,“1945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氛围。^⑥ 这其中的代表有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莱纳·莱普修斯(Rainer Lepsius)、克里斯蒂安·梅耶(Christian Meier)、托马斯·尼珀代(Thomas Nipperdey)、恩斯特-沃尔夫冈·博肯弗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迪特·格里姆(Dieter Grimm)、于尔根·科卡、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和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J. Mommsen)及他的孪生兄弟汉斯·蒙森(Hans Mommsen)。20世纪60年代后,他们一直拥有政治发言权;他们在争议中总是可靠的同一阵线战友;他们论证风格自由,对所有简化论证持怀疑态度。^⑦ 他们的历史研究充满使命感,竭力避免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称为“德国浩劫”的事情再次发生。^⑧

作为“1945一代”中的一员及比勒菲尔德学派社会史研究的奠基者,在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是社会影响力最大、最为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韦勒1931年出生

① 国内学界对比勒菲尔德学派及韦勒的既有研究,有从比勒菲尔德大学体制、平台,以及对年鉴学派结构史的借鉴角度进行的分析,参见王亚平:《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德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有对韦勒学术生涯的纪念性论述,参见景德祥:《纪念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汉斯-乌里希·韦勒(1931-2014)》,《武汉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有从德国史学史视角对比勒菲尔德学派进行的研究,参见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有从学科机制和社会资源视角对批判社会史进行的研究,参见范丁梁、吕一民:《历史社会科学:联邦德国史学领军流派崛起之路》,《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相关的研究著作参见孙立新、孟钟捷、范丁梁:《联邦德国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②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00*, Berghahn Books, 2007。

③ Helmut Schelsky, *Die skeptische Generation: Eine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Jugend*, Eugen Diederichs-Verlag, 1957。

④ Paul Nolte, *Hans-Ulrich Wehler: Historiker und Zeitgenosse*, C. H. Beck, 2015, S. 10。

⑤ 对“1945一代”的代际贡献和局限性的分析,参见Christina von Hodenberg, “Zur Generation der 45er: Stärken und Schwächen eines Deutungsmusters”,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303637/zur-generation-der-45er/\[2024-01-27\]](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303637/zur-generation-der-45er/[2024-01-27])

⑥ A. Dirk Moses, *Germ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zi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4-77。

⑦ “Interview mit Jens Hacke/Julia Schäfer”, in Rüdiger Hohls and Konrad H. Jarausch Hg., *Versäumte Fragen. Deutsche Historiker im Schatt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2000, S. 213。

⑧ A. Dirk Moses, *Germ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zi Past*, p. 57。

于弗罗伊登堡 (Freudenberg) 的一个加尔文教家庭。在高中毕业前, 韦勒一直成长于古默斯巴赫 (Gummersbach) 镇, 他和毕生挚友哈贝马斯在这个科隆以东的莱茵兰小镇一起长大。高中毕业后, 韦勒前往当时联邦德国的学术重镇科隆大学继续深造, 在此就读期间, 他得到联邦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特奥多尔·席德尔 (Theodor Schieder) 的青睐并追随其攻读研究生。1960 年, 韦勒以“1914 年之前德国社会的民主与民族问题”为题撰写毕业论文, 获得博士学位。^① 此后, 韦勒继续跟随席德尔进行学术研究, 并于 1969 年发表了教授的资格论文《论俾斯麦及其帝国主义》。^② 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内容经翻译后发表在英语世界颇具影响的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 上, 开启了韦勒产生国际化影响力的第一步。^③

韦勒的社会史范式无疑受到了先前学者的影响与启发。他在 1962 年出版了博士学位论文后,^④ 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 的资助前往美国着手《论俾斯麦及其帝国主义》的撰写。韦勒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工作, 但大部分时间在斯坦福大学, 而当时流亡美国的德国社会史先驱汉斯·罗森伯格 (Hans Rosenberg) 正在该大学任教。罗森伯格关于俾斯麦时期的经济、工业、普鲁士社会史和容克阶层的观点深刻影响了韦勒。^⑤ 韦勒后来在访谈中也提及, 他当时作为一个年轻学者, 试图在席德尔和罗森伯格身上寻找父亲的身影。^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韦勒在美国学术界名声大振, 1972 年在哈佛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讲座教授, 并开始在美国其他知名大学讲学, 包括普林斯顿大学 (1976 年)、斯坦福大学 (1985 年)、耶鲁大学 (1997 年) 等高校。^⑦ 返回德国后, 韦勒在柏林自由大学待过一段时间, 随后来到其开派立宗之地——比勒菲尔德大学——这个和他名字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学校。^⑧ 他去世后, 其挚友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代人的声音》的悼文, 深切怀念这位昔日好友, 并称他是“时代的先声”“德国思想史上的巨人”。^⑨ 哈佛大学历史学者查尔斯·梅尔 (Charles S. Maier) 也评价韦勒是“德国战后两代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⑩ 认为他对战后德国历史书写范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社会史”的德文术语使用上, 韦勒一般使用两个概念: 其一是“Gesellschaftsgeschichte”, 即所

① 有意思的是, 韦勒毕业六年后的 1966 年, 著名历史学家约恩·吕森 (Jörn Rüsen) 也毕业于科隆大学, 且与韦勒一样在席德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按照中国学统来看, 他们属于“师兄弟”关系。吕森入学科隆大学时是 1958 年, 韦勒毕业于 1960 年, 二人有两年的求学重合期, 但他们在科隆大学期间是否相识且有交集, 目前还未看到直接的文字记述。2007 年约恩·吕森卸任埃森高等文化研究所 (KWI) 所长时, 韦勒在鲁尔博物馆对吕森的卸任仪式和职业生涯做了主题致辞。

② Hans-Ulrich Wehler, *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 Kiepenheuer & Witsch, 1969, 中文版参见汉斯 - 乌尔里希 · 韦勒:《德意志帝国》, 邢来顺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Hans-Ulrich Wehler, “Bismarck’s Imperialism 1862 - 1890”, *Past & Present*, Vol. 48, Issue 1, 1970, pp. 119 - 155.

④ Hans-Ulrich Wehler, *Sozialdemokratie und Nationalstaa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und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n in Deutschland von Karl Marx bis zum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 Holzner, 1962.

⑤ 1988 年罗森伯格去世后, 中欧历史学会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Society, CEHS) 为纪念这位社会史研究先驱, 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罗森伯格奖”, 用来奖掖那些欧洲社会史研究领域杰出的著作与论文。

⑥ Hans-Ulrich Wehler, *Eine lebhaftige Kampfsituation: Ein Gespräch mit Manfred Hettling und Cornelius Torp*, C. H. Beck, 2006, S. 18.

⑦ David Blackburn, “Memorial Hans-Ulrich Wehler (1931 - 20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47, No. 4, 2014, pp. 700 - 715.

⑧ 韦勒详细的生平主要反映在其学生兼助手保罗·诺尔特 (Paul Nolte) 的著作中, 参见 Paul Nolte, *Hans-Ulrich Wehler: Historiker und Zeitgenosse*, C. H. Beck, 2015.

⑨ Jürgen Habermas, “Stimme einer Generation Zum Tod meines Freundes”, *F. A. Z.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Aug 07, 2014, S. 009.

⑩ Charles S. Maier, “Wissenschaftliche Nachrichten Hans-Ulrich Wehler: In Memoriam”,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40, No. 4, 2014, pp. 610 - 617.

谓的“社会史”；其二是“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指的是“历史社会科学”。韦勒用后者表示在理论指导下运用社会科学方式与方法论进行的历史学研究。韦勒及比勒菲尔德学派在历史研究领域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做法，一方面受到哈贝马斯倡导的社会理论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对德国自身社会科学理论和批判性传统的延续，当然这种延续是以历史学和现代化的方式展开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汉斯·格斯(Hans Gerth)等社会学家对马克斯·韦伯作品的整理和解读为韦勒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而这种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在德国有其自身传统。因此，在学界评价中，比勒菲尔德学派及韦勒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即是在德国学术传统中修复并发展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阶级、阶层等基本要素的批判性思考。^① 韦勒后来对德国社会史的诸多研究是沿着韦伯的路径前进。例如，韦勒在《德意志帝国，1871—1918》中对权力和财富的结构性分析、长时段论证、对精英阶层多元而明确的分析论证等均是如此。^②

与同时期的英、美、法历史学家相比，韦勒这一代联邦德国历史学家具有不同的政治影响力，尤其体现在对本国的历史与政治教育方面。总体而言，韦勒在战后联邦德国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不仅通过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学派构建和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路径达成，也通过“1945一代”整个世代的时代影响力而扩展。就学术组织而言，比勒菲尔德学派集中了以韦勒为首的大量年轻学者，这些年轻学者大多具有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学习的经历和背景，他们不断发表自己对国家、阶层、社会、权力等传统概念的新见解。^③ 就学术思想而言，韦勒等人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学术方法，通过“历史的社会科学化”，抛弃了德国史学的传统范式，即以历史主义为指导，以高度政治化、理念化的国家理论为方法的传统“族民史”的书写范式。通过对社会中诸要素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现实化批判，韦勒的社会史研究对当时社会而言几乎是一种“思想脱敏”，契合并引导了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思想发展趋势和价值导向。

二、史学转型：俾斯麦与帝国的新旧面貌

在传统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书写中，俾斯麦经常以伟大、雄才而著称，被视为近代德国真正的奠基者，这种历史图像的描摹十分绵长。对俾斯麦执政风格的总评价是“外交优先”，即外交政策在国家生活中占首要地位。这种解释方式“不仅是神圣的兰克式的，而且具有道德上的确证力”。^④ 借此，俾斯麦被塑造为一位纵横捭阖、具有高超外交手腕的“帝国创始人”。

为更清晰地理解韦勒对俾斯麦及其帝国主义理念新的思考路径，有必要简单回顾德国史学传统对俾斯麦和国家、帝国论的既有研究思路。“新兰克学派”的马克斯·伦茨(Max Lenz)和埃里希·马尔克斯(Erich Marcks)等学者对俾斯麦及其政治政策持赞赏态度，伦茨的俾斯麦传记说“德意志帝

① Charles S. Maier, “Wissenschaftliche Nachrichten Hans-Ulrich Wehler: In Memoriam”, pp. 610–617.

②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3.

③ 比勒菲尔德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韦勒、科卡、温克勒的研究具有强烈趋同性，德国的特殊性、历史连续性、资本主义与“西方”、20世纪的战争罪责是他们共同的研究主题。就差异性而言，韦勒和科卡最后试图建立研究的一般性理论，包括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反思，而温克勒试图将传统的政治史书写进行现代化论述，进而建立现代化的德国政治社会史研究。韦勒对理论性问题的研究参见 Hans-Ulrich Wehler, *Notizen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C. H. Beck, 2007; Hans-Ulrich Wehler, *Die Deutschen und der Kapitalismus: Essays zur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科卡的理论性研究参见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Arthur Lloyd Skop,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 Eckart Kehr and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arles A. Bear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3, No. 2, 1974, pp. 119–131.

国”是“一个人的作品”，马尔克斯也将俾斯麦视为“德国历史的完成者”，为专制强权进行辩护，并将希特勒和俾斯麦相提并论，由此在第三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受到极大嘉奖与肯定。^① 威廉·蒙森 (Wilhelm Mommsen) 在他诸多关于俾斯麦的研究中，也认为俾斯麦是“帝国真正的创造者”，^② 帝国建立几乎是“俾斯麦的作品：他的意志和他的行动”。在马尔克斯于 1936 年出版的作品中，他终于将俾斯麦塑造造成希特勒的开路先锋，而希特勒将成为帝国建立的完成者。^③

此外，在“普鲁士学派”学者的著述中，历史学家逐渐展现出为统一德国而进行历史写作的态势。这种写作方式带来的影响是，俾斯麦不仅从象征意义上，也在思想意义上成为国家英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 (J. G. Droysen) 提出的“目的之上的目的”“绝对的整体性”“希腊化时代”仍是继承黑格尔“世界精神”的历史学翻版。^④ 19 世纪下半叶，一些历史学家的作品，如亨利希·冯·西贝尔 (Heinrich von Sybel) 的《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的《国家科学理论》《十九世纪德国史》和德罗伊森的《普鲁士政治史》，不仅反映了当时文化精英的民族意志，也说明当时历史作品多从“精神”阐发统一的目标：德国作为一个民族，是道德的化身，且国家理性、国家强权、民族自由、个人解放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⑤

由此可见，不论“新兰克学派”还是“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写作，均在德国传统史学的框架内，主要特点是以唯心主义、历史主义为最主要的解释原则和解释工具，进而将两者与普鲁士时期特殊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结合，形成以精神、理性、权力、同质为特征的“精神科学” (Geistswissenschaft)。在经验领域内，统一体、同质化、国家理性自然成为最重要的史学主题，俾斯麦及其帝国主义理念也因此成为上述思想具象化、实践化的最好诠释和证明。

直到韦勒的社会史书写中，这位德国宰相才被赋予了新面貌。韦勒的教授资格论文《论俾斯麦及其帝国主义》在当时看来无异于一部“石破天惊”之作，他没有采用传统历史主义视野下的政治叙事，反而将关注重点放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变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引发的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为他本人后来的其他研究及整个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学术走向奠定了基础。韦勒对俾斯麦的研究吸收了埃卡特·克尔 (Eckart Kehr) 的观点，最突出的观点是“内政优先” (Primat der Innenpolitik)。^⑥ 简言之，韦勒认为，俾斯麦当政时期德国帝国主义的“根本性的推动力”并不在于外交和国际环境，而是德国“工业化过程开始和快速扩展的结果”。在该书中，韦勒撰写了

① 1902 年，马克斯·伦茨指出：“对主要受民族自由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和德国大部分人来说，德意志帝国的形成现在被认为是一个人的作品——第一位帝国总理的作品。”参见 Max Lenz, *Geschichte Bismarcks*, Duncker & Humblot Verlag, 1902。埃里希·布兰登堡在他 1916 年发表的著作中，将这种个人化的解释规范成长期存在的形式，参见 Erich Brandenburg, *Die Reichsgründung*, Quelle & Mayer Verlag, 1916。埃里希·马尔克斯的著作，参见 Erich Marcks, *Otto von Bismarck: Ein Lebensbild*, Cotta, 1915; Alexander Schmid-Gemig, *Historians' Galler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Erich Marcks (1861 - 1938)*,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1997。

② Wilhelm Mommsen, “Bismarcks Kleindutscher Staat Und Das Grossdeutsche Rei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 167, No. 1, 1943, S. 66 - 82。蒙森关于俾斯麦的其他作品，参见 Wilhelm Mommsen, *Politische Geschichte von Bismarck bis zur Gegenwart 1850 - 1933*, Diesterweg, 1935; Wilhelm Mommsen, *Bismarck und seine Zeit*, Teubner, 1937。

③ Erich Marcks, *Der Aufstieg des Reiches*, Bd. 1,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6, S. XII - XIV。

④ Jörn Rüsen, *Begriffene Geschichte: Genesis und Begründung der Geschichtstheorie Johann Gustav Droysens*, Schöningh, 1969。

⑤ 韦勒本人对此做过很好的研究，参见 Hans-Ulrich Wehler Hg., *Deutsche Historiker*, Bd I, Kleine Vandenhoeck-Reihe, 1971。

⑥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ss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Walter de Gruyter, 1965, S. 1 - 29; James J. Sheehan, “The 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 Eckart Kehr's Essays on Modern German Histor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1, Issue 2, 1968。

一篇长达25页的导言,他开宗明义地说:“历史学家自由、批判的历史意识今天必须证明自己,历史学也可以像社会学具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方向一样,将自己(的事业)理解为批判的社会科学。”^①接着,他从1873年德国“大萧条”和社会危机开始着手撰述。韦勒认为,经济和社会危机导致德国国内上层、中层和工人各阶层产生了一种“思想共识”:即采用“出口攻势”和“社会帝国主义”治愈帝国的社会经济弊病。进而,俾斯麦通过政府行为鼓励德国海外商人大肆扩张,并给予他们补贴。韦勒还分析了德意志的政策转型,他认为德国从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政府施行扩张主义政策的“非正统帝国”(informal imperialism)转向对非洲和太平洋的帝国保护,而走向真正的殖民统治。韦勒将俾斯麦的政策总结为务实的商贸扩张与“社会帝国主义”操控相结合,以维持并强化德意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

韦勒将俾斯麦及其帝国政策由“外交至上”转换为“内政优先”的解释原则,其中史学思想、政治意涵的差别在于,在“外交至上”的解释原则下,俾斯麦作为杰出的德意志政治家,通过他的外交斡旋和争取,为德意志在中欧复杂的地缘政治中保证了统一与生存空间。俾斯麦成为一位克里斯马(Charisma)式的政治人物。19世纪,德国现代历史学家大部分来源于受教育的新教资产阶级,他们以贵族教育为特征、以“精神”理念的强大为优先——这种理念本就预设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厌恶。^②在这种史学范式下,德国传统的唯心主义、庸俗化的路德教权威乃至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以及流行的历史神学,就成了传统而有力的思想资源,一直统摄着德国历史研究。韦勒采用的批判社会史视角,以当时德意志快速发展的经济、工业化、社会阶层的构建、社会危机为主要着眼点,以“内生力量”(endogenen Kräfte)为主导原则。因此,帝国主义不仅意味着思想、理念、国家的优先地位,更是这种原则深刻的经济根源。他认为,当时德意志各阶层的实际经济和政治诉求、多重社会危机才是导致俾斯麦政府扩张主义贸易原则的根本原因。在此过程中,正是通过不断的强化和操控,德国的海外殖民才成为确定的事实,最终形成了传统帝国特性的政治外延和现代社会经济内核的杂糅共生,这成为第二帝国的突出特点——即“独特道路”(the German Sonderweg)在社会史书写路径中的凸显。

韦勒采用的新社会史的史学范式和解释方式的意义就此凸显出来。首先,就俾斯麦个人形象而言,韦勒逐渐淡化了他在传统史学书写中的克里斯马形象,使其成了德国近现代国家转型的一个结构成分。其次,就帝国主义概念而言,被传统德国思想认为具有天然优先权的精神、理念、统摄力(Herrschaft),让位于同样是帝国主义重要基础和推动力的经济、社会、工业发展。再次,在前面两点基础上,韦勒试图提出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并不局限于德国的历史经验,它同样能用来分析美国等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帝国主义,^③韦勒为帝国主义概念的一般理论与比较研究做出了贡献。最后,在这些工作背后,韦勒基于二战后的学术语境和国家现实,对俾斯麦这样一位在德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进行社会史范式下的改写,一方面契合了战后社会对纳粹反思的需求,这需要彻底反思德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路径和走向,俾斯麦及其帝国主义政策是无法绕开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和社会导向的“内生力量”原则,韦勒以批判的社会科学方法,引领了战后史学界的学术潮流。对俾斯麦旧面貌的抛弃和新面孔的塑造成为战后历史反思的重要构成,在最终的历史

① Hans-Ulrich Wehler, *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 S. 15.

② Hans-Ulrich Wehler, *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 S. 30.

③ Hans-Ulrich Wehler, *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s Imperium Americanum 1865 - 1900*,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74.

解释上,韦勒将俾斯麦处理成德国近现代历史转型、通往现代化国家的组成部分,以此来避免传统范式中以精神、理念、民族为优先的历史解释模式。^①

三、第二帝国的结构分析与价值导向

韦勒一生著作等身,除学术创作,他对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也做出了重大贡献。^② 1975年由韦勒一手创刊的研究杂志《历史与社会》(*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今日已成为德国史学界最重要的期刊之一,从该杂志使用的副标题“历史社会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就能看出,它的议题仍以社会史研究为中心。^③ 韦勒在发刊词中写了如下研究宗旨和未来期望:

《历史与社会》是一本跨学科期刊。它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即历史学自认为是历史社会科学,它的工作需要与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系统的密切联系……该杂志的主题是社会及其历史——广义的社会历史,被理解为以特定社会形态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现象的历史。中心主题是社会变革过程和结构的研究展示。分析重点将是社会阶层、统治的政治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对应的变化和持续状态应兼有考虑。《历史与社会》希望为超越传统政治史的新形式的社会史铺平道路,但并不放弃政治史维度。相反,基于社会科学的政治史是我们工作领域的一部分。^④

发刊词中陈述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价值导向,是对韦勒本人乃至比勒菲尔德学派学术研究的精炼总结。其中明确提出两点:一是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吸收采纳,将历史学改造为历史社会科学;其次,将历史学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知识产物,将其研究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中去理解,强调历史学的“社会致用”,将历史学从德国传统历史哲学“凌空蹈虚”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使其直面社会现实状况。韦勒以社会史视角对第二帝国处理时,涉及的根本问题是第二帝国的价值导向与历史意义。这一问题对第三帝国的价值批判及反思纳粹具有直接影响,也同时决定了联邦德国未来的政治方向。

约阿希姆·勒施纳(Joachim Leuschner)在《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编者前言中提出三个关键词对本书的内容与写作进行概括,即反思、批判和启蒙。这三个关键词揭示了该书写作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的联邦德国正处在对纳粹历史(“第三帝国”)进行反思的关键阶段,如何处理希特勒和纳粹历史,需要回溯到前一个历史时期(“第二帝国”),这样才能“知其来路”,为德国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开辟新的场域。《德意志帝国,1871—1918》是韦勒所有著作中传播最广、再版次数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作品,甚至被用作大学教材。约翰·布勒伊(John Breuilly)评价该书是“解释

① Josep Maria Bech, “On the Political Rewriting of the Past: The *aporiae*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Lo Sguardo. Rivista di Filosofia*, Vol. 29, Issue 2, 2019, pp. 163–182.

② 过去40年,在韦勒帮助下出版的系列丛书《史学批判研究》(*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发表了一系列对德国近现代史研究有开创性、挑战性和批判性的成果,特别是有关德国政治的社会史研究。

③ 事实上,《历史与社会》的学术视野已扩展到整个现实问题领域和史学热门领域。比如,近来对现实性主题“欧洲移民制度”“社会史视角下的新冠病毒”和史学热门主题“知识与迁移”“概念史的新路径”“数字历史”等的研究。参见杂志官网目录 <https://www.hsozkult.de/journals/id/z6-14303> [2022-05-10]

④ Die Herausgeber, “Vorwort der Herausgeber”,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1, H. 1, 1975, S. 5–7.

性的导向研究”，这是其能被广泛传播、作为教材使用的原因。韦勒后来陆续出版的重量级作品，五卷本的《德国社会史》就是以研究性导向为定位，^①某种程度上而言，《德国社会史》是对比勒菲尔德学派秉持的学术理念的“执行”，它建立了一个更详细的、以研究为导向的德国现代史的写作方式，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及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出发（而非传统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是对韦伯多元主义方法的“实践化”。^②这是对《德意志帝国》研究概念的修正与转换。尼珀代在《德国社会史》书评中对两本著作的差异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德意志帝国》是在现代化理论视野下，以结构功能主义为核心的纲要性作品，而《德国社会史》明确区分了前因和后果，避免了意图和结果的混淆，在经验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对现实主义的追求替代了前者以功能主义为核心的研究。^③

在此基础上，韦勒对第二帝国的分析采用长时段的结构分析方法。他认为，从俾斯麦的帝国主义政策到1939年希特勒的扩张政策，存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这个“连续性”是德国发展的“特殊路径”，特殊路径的不断推演，高潮表现即是纳粹和第三帝国的出现。在具体分析中，韦勒认为，政治上俾斯麦（和旧精英们）通过统一战争在宪政冲突中战胜了资产阶级，这是“国内政治整合的预防性战争”，旨在“防止普鲁士军事君主制的政治—社会危机”。^④经济上，由于德国经济萧条对第二帝国的影响，导致1895年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sierten Kapitalismus）的发展，结果是高度的工业化和农业资本主义精英的“威权统治”。韦勒认为，第二帝国的政治是“专制的、半极权主义的、伪宪政的（pseudo-constitutionalism）”，是由波拿巴式的独裁体制演变为受顽固保守官僚机构领导的多头政体。经济利益组织通过消极整合等政策抵制来自底层的反抗。为保持这一套体系的有效运作，帝国需要一系列结构性的“整合框架”阻止民主的发展，例如，国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对敌人的刻板印象和少数族裔的敌意等。帝国利用对教会（等级制的反现代主义）、教育体系（威权社会化）和阶级正义（臣民心态和避免冲突的想法）的制度化，并通过社会政策的缓和性或国外的声望政策得到回报。最终的结果是为解决国内的矛盾和冲突，以“预先阻止”（Flucht nach Vorne）的方式在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后来的《德国社会史，1849—1914》，韦勒对第二帝国的论述明显更为客观，或更符合现代史学的“理性方法”。他从人口发展、经济结构、工业化、社会结构的发展、政治统治的变迁及社会文化运动方面，对第二帝国展开了全面分析。在导言中，韦勒指出，第二帝国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历史问题和当前的方向问题”，其对于社会史的研究来说依然“令人着迷”。^⑤在具体行文中，韦勒提供了详细的数据史实。比如，他对1871—1914年德国各州的人口变化、人口迁移与增长、人口城市化进行了详细分析。^⑥

① 《德国社会史》出版于1987年至2008年，共五卷，参见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1,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Reformära 1700 – 1815*, C. H. Beck, 1987;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2,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 – 1845/49*, C. H. Beck, 1987;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 C. H. Beck, 1995;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C. H. Beck, 2003;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5, *Bundesrepublik und DDR 1949 – 1990*, C. H. Beck, 2007。

② John Breuilly, “Hans-Ulrich Wehler: A Tribute”, *German History*, Vol. 33, No. 2, 2015, p. 3.

③ Thomas Nipperdey, “Wehl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14, No. 3, 1988, S. 403 – 415.

④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 – 1918*, S. 37.

⑤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 S. 491.

⑥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 S. 494 – 546.

韦勒还对俾斯麦时代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该制度总体以俾斯麦总理政权作为协调中心,以君主制、官僚制、国会、军队为辅助机制来实现统治意志。^① 韦勒在对“俾斯麦社会帝国主义”(Bismarcks Sozialimperialismus)的分析中指出,核心问题是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而非对外经济政策的确立。当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功能和目的达到极限时,必然在帝国晚期走向集权政治(MachtKartell)。^② 最后,韦勒在否定并批判“独特道路”的基础上借用韦伯的话认为,在官僚制国家,公民被剥夺了自由并像“牲畜”一般被管理,未被视为国家的共同主人,^③由此为第二帝国的历史进行了定性。

韦勒对第二帝国基本持全面批判的态度,并认为这种旧体制的惰性一直贯穿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短期内,“社会帝国主义、社会保护主义和社会军国主义的邪恶三位一体在维护精英权力方面取得了成功。只是造成了一系列沉重的历史责任,并于1918年、1933年和1945年为此付出了代价。”^④ 韦勒采用的结构功能主义路径是一种非典型的历史学方法,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对此评价说:“韦勒似乎试图在纸面上进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革命。特权、压迫及其近代的学术捍卫者受到了严厉的攻击。韦勒回溯性地把贵族挂在灯柱上。”^⑤

韦勒就此颠覆了俾斯麦及帝国建立在德国历史中的形象。在传统观点中,帝国建立通常被视为国家的英雄壮举,而现在它变成了俾斯麦的恶行。第一任帝国总理从光辉的国家英雄变成了邪恶阴险的操纵者,被约翰内斯·威尔姆斯(Johannes Willms)形容为“德国的恶魔”。^⑥ 韦勒和沃尔夫冈·蒙森等历史学家强调,通过建立帝国,俾斯麦阻止了德国本该进行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德国因此走上了一条扭曲道路,并最终走向纳粹主义。1871年的民族国家由军国主义的精神中产生,演变为反犹太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温床,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存在明显的延续性。因此,综合上述分析,韦勒对第二帝国历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韦勒对德国近现代历史的演进分析,体现出对长时段起源论的追随和实践。面对反思和批判纳粹历史的需求,韦勒在处理第三帝国的起源、建立、行动和遗产时,未将目光局限在第三帝国历史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将目光投向德国历史的更深处。按照韦勒的逻辑推论,希特勒和纳粹的出现,从俾斯麦统一全德的时候开始,在德意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因素中,就成了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⑦ 然而,这种分析路径必然会导致道德责难,也即是说,韦勒认为对希特勒

①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 S. 849 - 889.

②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 S. 990 - 993.

③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 - 1914*, S. 1295.

④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 - 1918*, S. 239.

⑤ Jonathan Sperber, “Master Narratives of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Histor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4, No. 1, 1991, p. 79. 斯珀伯将尼珀代、韦勒和詹姆斯·希恩(James Sheehan)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三本德国史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评论,富有启发性,参见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 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C. H. Beck, 1983;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 1, *Vom Feudalismus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r defensiven Modernisierung der Reformära 1700 - 1815*; James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70 - 186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⑥ Johannes Willms, *Bismarck: Dämon der Deutschen*, Kindler Verlag, 1997.

⑦ 正如“费舍尔之争”探讨的核心问题,即第二帝国在1914年蓄意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三帝国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这并非德国历史上的“意外事件”。韦勒等人的认识更进一步,根据他们的解读,在普法战争时,俾斯麦就开启了军国主义政策的传统,这场战争对帝国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俾斯麦在1870年“七月危机”扮演的角色,过去常被誉为他天才和民族信仰的证明,现在成为描述他战术狡黠的证据。

的批判,不仅应拓展到第三帝国的普通民众,且应拓展至德国的漫长历史。

第二,韦勒对第二帝国的历史处理,体现了强烈的价值批判和价值引导。众所周知,史学职业化后,史学研究秉持的基本立场是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客观、真实、中立也是现代史学的合法性基础。韦勒作为职业史家,对第二帝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要素进行研究时,对旧体制下精英与官僚体制的顽固、威权统治,以及当时的快速工业化和重工业发展做出了明显的价值批判,他将其称为“病态的”和“非正常的”现代化路径。^①当然,这种价值判断和引导是可以解释的,正是出于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批判的价值立场,韦勒才对更早的德国历史做出了判断。

第三,韦勒对第二帝国民族国家的研究使用了社会史研究的结构分析方法。韦勒没有以德国传统史学的方式处理第二帝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即采取高度政治化、高度理念化和理想化的史学书写,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概念进行强化论证,研究它的阶级形成、国家构建、工业资本的发展、农业资本的威权统治,以及全部这些元素背后相应的专制体制和多头体制。为保证这些体系的正常运作,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导向是配套要素。社会史的结构分析方法使长久以来被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历史主义和历史哲学等遮蔽下的社会运作及社会成因进行了展现。

第四,韦勒对德国近现代历史进路的研究,展现了史实性和概念性的融合思考。韦勒的研究通常涉及几个常用概念,像“独特道路”“连续性”“正常路径”等,这些概念与德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有关。总体而言,在追溯德国从1871年开始到两德统一的历史进程时,在社会结构中,容克阶级、工业资本家、农业资本精英等与旧体制是如何合作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是如何建基于其上的,如何将传统与现代联系起来,其中制度性要素或关键人物扮演了何种角色,如何将“柔性”价值批判、话语体系、文化塑造与“硬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在解释方式上相互关联起来,这些问题是韦勒社会史分析路径的重点考察的对象。^②

对第二帝国复杂性的解释包含现代性思考,比勒菲尔德学派和其对手的辩论仍在继续。^③历史学的多元化和反历史主义解释路径,被沃尔夫冈·蒙森等人理解为真正的“收获”,即通过质疑传统历史学的立场,以激进的方式“拷问”历史学界的前辈。^④在政治层面,韦勒及其同辈人对联邦德国宪法基础和不断巩固的政治文化的承认,逐渐上升为其政治认同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对战后联邦德国的民主塑造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的文化史转向、全球史兴起使韦勒等人的研究被置于多元化的思考语境。在完成价值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历史责任后,韦勒的思考也有了明显转向,韦勒一方面回应文化史的“挑战”,^⑤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走向一般化和理论化,对民族主义、历史思考、社会不平等、资本主

① 在战后反思的历史语境下,帝国的建立、皇帝制度和俾斯麦等历史场域并未成为民众历史认同的场所,而被宣传为不祥的军国主义传统的起点。对此,德国人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就像与纳粹保持距离一样。伊丽莎白·费伦巴赫(Elisabeth Fehrenbach)在1970年指出,这种评判也是“对自身所处时代背景的反应”。参见 Elisabeth Fehrenbach, “Die Reichsgründ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Theodor Schieder und Ernst Deuerlein, Hg., *Reichsgründung 1870/71*, Seewald Verlag, 1970, S. 289。

② John Breuilly, “Hans-Ulrich Wehler: A Tribute”, p. 3.

③ 沃尔夫冈·蒙森回忆有关“费舍尔之争”的辩论时说:“这是‘老一辈国家政治历史学形式的天鹅挽歌’,必然导致对老一辈的攻讦。”参见 Wolfgang J. Mommsen, “Gegenwärtige Tendenzen i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Bundesrepublik”,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7, No. 2, 1981, S. 162。

④ Wolfgang J. Mommsen, “‘Wir sind wieder wer.’ Wandlungen im poli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der Deutschen”, in Jürgen Habermas Hg., *Stichworte zur ‘Geistigen Situation der Zeit’*, Suhrkamp Verlag, 1979, S. 200。

⑤ Hans-Ulrich Wehler,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Kulturgeschichte*, C. H. Beck, 1998。

义、历史连续性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理论化的表述,^①可将这种研究的理论化和一般化趋势理解为韦勒脱离早期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而走向全球性思考的学术表现。

四、韦勒的争议、回应与遗产

韦勒的社会史研究范式由于明显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批判、长时段解释体系、德国中心论及目的论的书写方式招致诸多批判与争议。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托马斯·尼珀代。在对韦勒《德意志帝国》的基本观点和论证内容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尼珀代进而认为,韦勒的研究违背了历史论证的基本原则,以总体评判的方式代替了对历史情境细微差别、偶然性和复杂性的考察。首先,尼珀代指出,韦勒的长时段起源论“将曾祖父放在历史审判台上”。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不仅是原告和法官,同时是立法者,这种对过去的批判性分析是“咄咄逼人”的。其次,在尼珀代看来,韦勒对德国历史连续性的批判和否定并非颠扑不破。在韦勒的分析中,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发展是唯一的,而尼珀代认为“连续性”是一个多元概念。最后,尼珀代指出,韦勒用有争议的内容来填充民主和有效制度的合法概念,进而将历史写作的价值导向了政治教育,并把这种价值导向与客观性概念联系起来,让人无法充分争辩。^②这会导致对历史学学术性质的质疑,即历史学是否存在如此前提:解释当下发生的事,最好的方式就是据此对先前史实进行重构。保罗·诺尔特就此评价说:“在尼珀代眼中,韦勒代表了一种史学趋势,即用现在的标尺来衡量过去,然后将其标记为缺陷。”^③尼珀代认为,帝国的建立同样也是现代德国的形成时期。这种现代性具有多重潜在元素,既有民主也有威权。因此,帝国的建立并未使德国朝某个方向产生路径依赖。^④

吊诡的是,就一元化论证和“霸权”式的解释方式而言,韦勒对俾斯麦及德国历史的批判与他批判的传统史学的解释方式十分接近。“将曾祖父放在历史审判台上”和现代基于个体的法理原则是冲突的,会成为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谓的“形而上罪责”。同时,连续性概念基本被现代史学认为是追溯性的后发概念,而韦勒对德国历史的批判性分析甚至有将德国历史连续性进行本体化处理的倾向。本身昭示“价值中立”的客观性概念,被韦勒同政治教化、价值评判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无法讨论的问题。全部这些论述原则和现代史学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异,尼珀代准确地抓住了韦勒论证的缺陷。尼珀代这篇针对性强且极为严苛的批判论文,发表于当年韦勒创刊时的《历史与社会》杂志,这既说明了韦勒的学术宽容,同时也符合韦勒对于学术性问题的“辩论原则”(agonistic principle)。

还有其他学者对韦勒的学术路径展开批判,如汉斯 - 冈瑟·兹马兹利克(Hans-Günther Zmarzlik)等人,但他们对韦勒的批评并未超出尼珀代提及的这一点。^⑤不过,如果深入历史情境理解韦勒的社会史路径,或许可以取得理解性认同。对韦勒这一代学者而言,德国传统的思想路径、民族

① Hans-Ulrich Wehler, *Nationalismus: Geschichte, Formen, Folgen*, C. H. Beck, 2016; *Historisches Denken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1945 - 2000*, Wallstein, 2001; Hans-Ulrich Wehler,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Bewegung, Führerherrschaft, Verbrechen. 1919 - 1945*, C. H. Beck, 2009; Hans-Ulrich Wehler, *Die Deutschen und der Kapitalismus: Essays zur Geschichte*, C. H. Beck, 2014.

② Thomas Nipperdey, "Wehlers 'Kaiserreich'. Eine kr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 1, H. 4, 1975, S. 539 - 560.

③ Paul Nolte, *Lebens Werk: Thomas Nipperdeys Deutsche Geschichte*, C. H. Beck, 2018, S. 197.

④ 参见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 - 1866*, C. H. Beck, 1983;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 - 1918*, C. H. Beck, 1990 - 1992.

⑤ Hans-Günther Zmarzlik, "Das Kaiserreich in neuer Sich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 222, No. 1, 1976, pp. 105 - 126.

认同已被打破,而新的德国认同和民族意识尚未建立,德国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对德国历史的撰述和反思方式,某种程度上决定德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方向。基于此,韦勒的社会史研究通过价值批判将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升到新高度。

杰夫·埃利和大卫·布莱克伯恩等英美学者不同于韦勒的思考路径,他们对韦勒在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研究中采用的“从上而下”视角展开批判——韦勒的社会史研究依然有宏大叙事的逻辑阴影。在他们看来,1914年前德国社会的动态发展机制,只有采取“从下往上”的研究视角,关注底层人民和普通人的困境,才能真正理解并解释德国社会,这即是后来兴起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研究。^①对韦勒来说,这类议题是民主社会学术辩论的调剂品,他并未脱离既定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而走向当时的“新史学”。

韦勒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应,至少在1994年第七版的《德意志帝国》中,韦勒将各个学者对此书的批评论著目录附在最后,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学术批评。1977年韦勒以《批判与批判性的反批判》为题,对尼珀代、兹马兹利克、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等人对他的批判进行了详细回应和解释。首先,韦勒认为尼珀代等人对他研究中缺乏历史细节和充足材料的批判并不恰当,他认为尼珀代等人的观点是一种“新兰克主义”的论述视角,对历史研究的理解仅局限于经验性内容,是新版的“让事实本身说话”,而历史研究不只是经验性表达。其次,韦勒接着认为,历史研究在塑造人们的思想,关于资料来源的研究需要事先概念化和理论引导,并在具体时空展开,因此,历史研究的经验性质只有在理论上才有效。再次,在学术立场上,韦勒明确指出此书基于“教学性”和“教化性”目的,且提出了明确论点,其他人可以参与讨论,可以通过论辩方式确认自己的学术立场。最后,韦勒进行总结,认为所有这些批评给了他机会,能够阐明自己的社会史路径与研究方法,进而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式过渡到新的、更为深刻的德国现代史研究路径。^②

韦勒及比勒菲尔德学派的社会史研究,是德国历史研究现代转型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成果,战后联邦德国也由此逐渐实现了价值结构调整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走向了“去中心”和“去本质主义”的路径。韦勒对德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进行的批判性研究,给德国史学界乃至整个世界史学界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晚年韦勒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历史学家的范围,他成为德国社会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参加各类政论节目,参与德国土耳其移民和贫富分化等时政问题的讨论。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年轻时作为体育健将的韦勒回忆了彼时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对他说过“继续为共和国而奋力奔跑吧”的话语。^③韦勒取得的学术成就和留下的思想遗产已成为德国历史和史学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讲,他确实成了那些和德国历史共同奔跑的“一代人的声音”。

(作者尉佩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邮编:030006)

(责任编辑:崔瑾)

(责任校对:张旭鹏)

① Geoff Eley, “Defining Social Imperialism: Use and Abuse of an Idea”, *Social History*, Vol. 1, Issue 3, 1976, pp. 265 – 290; David Blackbourn, *Class, Relig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Wilhelmine Germany: The Centre Party in Württemberg before 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Hans-Ulrich Wehler, “Kritik und kritische Antikritik”,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 225, No. 1, 1977, S. 347 – 384.

③ Charles S. Maier, “Wissenschaftliche Nachrichten Hans-Ulrich Wehler: In Memoriam”, pp. 610 – 617.

political development, aiming at reclaiming its historical roots. Historical research in fields such as policy history also extensively draws on political science's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is crucial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s a whole. By trac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 betwee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 can also provide a perspective on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ng China-related Knowledge at the Royal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1660 – 1820) // Zhuang Xi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and 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s, it is significant to re-examine how glob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ecome intertwined. By analyzing specific cases and methods of the Royal Society's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of China-related knowledge from 1660 to 1820,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circulation. By doing so, we can explore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society acquired China-related knowledge. The scientific correspondence system, the Jesuit information network, logistics mechan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flow of personnel have jointly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pathways for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circul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The history of overlapping and integrating multiple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s also contains valuable experiences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in the American Academia // Xu Xiangyun

For a long time, the American academia has avoided discussing the existence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Not until in the 1960s did this lack of attention start to change. Driven by social backgrounds and academic currents, American scholars beca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imperial n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 result,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mpire delve into the imperialistic asp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ental expansion and overseas activities,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like diplomatic activitie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personnel flows, domestic policies, social currents and norms,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enhanced its critical nature, and facilitat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uropean counterpart, offering a valuable historical approach that warrants further research.

Value Critiqu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Path and Practice of Hans-Ulrich Wehler's Social History // Wei Peiyun

Hans-Ulrich Wehl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storians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as well as the founder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In the analysis of Otto von Bismarck and German imperialism, Wehler demonstrated the basic path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Bielefeld School,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German historiography of interpreting Bismarck and the Second Empire through the lenses of national rationality, idealism, and historicism.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old interpretation of "diplomatic first", he employed a new approach of "domestic first", which is more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onditions, treating them as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behind Bismarck's policies and his imperialist idea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econd Reich, Wehler employed the long-term origin theory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showing strong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which provoked heated discussions. Wehler's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erman critical reflection on Nazism after World War II. It is also a significant expression and achievement of the adjustment of social values and acade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post-wa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Wehler has left a rich intellectual legac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rough his academic thoughts, public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ttitude.